

专家热议金融中心错位竞争

城市金融实力综合提升有赖多方发力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25日,多位专家在2018天府金融指数发布会暨四川省科技金融发展规划(2018—2020年)发布会上,就区域错位竞争及协同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专家表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已逐渐从重视金融数量、规模转向重视金融的结构和功能,强调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和农村金融。未来地方金融发展要适应整个金融发展的大趋势,高度重视技术的影响。同时,未来在区域金融发展的评价中,可以考量风险、管理和金融稳定等方面的能力。

从发布的2018天府金融指数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占据全国金融中心排名的前三位,并与其他城市拉开一定距离,广州、杭州、成都三个城市处于第二梯队,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减小。重庆、南京、武汉、天津处于第三梯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北上深分列全国金融中心前三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青介绍,2018天府金融指数的评价范围涵盖全国4个直辖市、26个省会城市(除拉萨)和15个计划单列市,构建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从业环境、人力资源、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农村金融八个子指数,并增加了消费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观察的新型金融业态。

从总指数得分增长率来看,前十城市的平均增速达到6.85%,其中南京和广州表现突出,增速超过10%。成都也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其指数得分增速为7.8%,在前十名城市中位列第三。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第一梯队城市由于金融发展起步早,基础体量大,其得分增速低于平均水平;第二、三梯队城市则借助后发优势加速前进。

从子指数的得分和排名来看,何青介绍,位列前六名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在各个子指数的得分上都比较领先,这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相对而言,北京、上海在农村金融方面表现较为一般,上海在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方面与北京差距较大。深圳发展较为均衡,广州在农村金融方面进步空间较大,杭州在人力资源方面排名较低,成都在从业环境方面排名稍落后。对于其他城市,重庆排名第七,优势在于绿色金融,但综合竞争力难以与前几个城市相匹敌。南京、武汉和天津在传统金融领域基础雄厚,并在新兴金融业态中有独特的优势,未来进步潜力较大。

“在金融发展当中,逐渐从重视金融数量、规模转向重视金融的结构和功能,强调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和农村金融,这些实际上都是与金融、实体经济的密切结合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表示。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意识增强

天府金融指数由八个子指数构成,从八个方面反映各个中心城市的金融发展动态。

在金融市场这一分指数中,北京、上海和深圳优势巨大。广州、杭州位列第四、第五,各方面比较均衡,但与北上深还存在一定差距。成都位列第七,与上期持平,其保险市场排名靠前,股票市场和其他直接融资市场是较为落后的领域。与去年对比来看,南京、郑州和济南进步明显。南京由第九名升至第六名,主要源于其保险市场发展较快。郑州在保险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其保险密度位列全国第一。济南虽然整体排名不高,但是在货币市场方面表现领先,且其信贷市场与保险市场提升较大。重庆信贷市场的发展可谓可圈可点。

在金融人力资源指数之中,北京、上海高等院校多、人才集聚,人力资源环境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西安和成都分别位列第三、第四和第五。西安和武汉发展较为均衡,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在人力资源数量上具有优势,长沙在人力资源质量上表现突出,深圳、长沙在人力资源基础上短板明显,北京、上海和天津在人力资源潜力上有较大提升空间。成都需要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

何青强调,金融实力的综合提升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并从多方面共同发力的过程。短期内,金融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间相对差距和名次不会发生太大变动,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和重庆等城市。总体而言,各中心城市可依托天府金融指数综合评价体系,在金融中心的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扬自身优势吸取经验教训,实现金融综合实力的提升。

根据本期天府金融指数的评价结果,何青介绍,从得分来看,东部地区指数得分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这说明东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优越。中部地区总指数的得分和均值均位居第二,表明东部金融发展的扩散效应正有效带动中部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反映中部崛起战略初见成效。西部地区的指数得分相对较低,但其增速位居全国之首,这说明虽然西部金融基础薄弱,但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增强了西部主要城市的金融发展意识,并且为西部发展金融提供了资源支持。东北地区的指数得分相对较低,并且金融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这反映出东北地区发展地方金融的资源 and 实力有所欠缺。

地方金融发展要适应大趋势

“无论是在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过程中,需要对金融发展的目标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思路。”杨涛认为,未来地方金融发展要适应整个金融发展的大趋势,高度重视技术的影响。在重视过程中,更加关注如何为地方金融科技发展创造基本要素和条件,包括人才、技术、数据、场景、生态、政策和空间布局。“未来一个地方的金融发展,可能面临的都是这种新技术环境下的开放状态,不再是一个行政区域内狭义的思考,而是有一个多元布局以及产业链的不断交叉,每一个地方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在何青看来,金融市场是一个需要积累的指标维度,东部城市在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聚集很多企业、金融机构,必定会反映在金融市场规模上。西部落后地区的追赶需要从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突破,并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努力缩小与一线城市之间的差距。

何青表示,从业环境是金融中心建设重要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既要通过环境吸引人才和企业,又要做到在人才和企业聚集之后,环境不会大幅下降,这需要一个完善的发展规划。此外,杨涛提出,未来在区域金融发展的评价中,可以考量风险、管理和金融稳定方面的能力。因为或大或小的风险和波动会越来越频繁,一个地方金融是否健全和稳定并不是任何风险都不爆发,而是如果发生了风险后,管理风险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强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一个地方金融发展的软实力。



■ 高端访谈

刘元春:重点防范房地产金融等领域风险 进一步降准应提上议事日程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25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汇率风险、局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需重点防范。刘元春建议从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抑制政府信用和类政府信用过度膨胀等方面化解风险、提振民营企业信心。货币政策方面,建议适度提高M2增长速度,降准应提上议事日程。

多领域金融风险亟待防范

刘元春: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在多方协同发力下,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接下来一段时间,应重点防范哪些领域的金融风险?

刘元春:首先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房地产金融风险。一方面,近三年来,房地产市场在调控后积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这些存量风险如何释放,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路径。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发现目前新一轮的房地产销售对象以一些三四线城市居民特别是中等收入居民为主,这些市场主体

本身对房价波动产生的影响比较敏感,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由此导致这类人群所形成的住房抵押贷款,其资产质量与前几轮抵押贷款质量是有所差别的,未来应成为房地产金融风险管控的核心。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汇率风险,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出现逆转,结构性裂痕正在全面显现,美国经济周期和外国国家经济周期的错位越来越大。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出现分化,全球金融格局在高债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结构性裂痕的冲击。我们看到了土耳其、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新兴经济体,集中爆发了汇率危机。需要注意的是,汇率并不是危机的起因,而是上述这种结构性裂痕及前期的高债务、低增长、低效率等综合作用的所致。

当前我国汇率承压,与近期市场信心低迷、资本外流等因素相关。而我们还需面对的是:经常项目顺差在未来可能迎来平衡期,从以往大幅顺差转为基本是零左右,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异动,短期肯定会对汇率带来冲击。汇率的冲击最直接的是对市场信心的冲击,同时还将通过离岸市场,导致在岸和离岸的互动。因此,汇率风险应成

为明年管控金融市场重要的着力点。

第三个很重要的风险点在于局部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高速增长带来了很多问题。未来随着土地财政政策分化、土地市场改革,税收基础发生变化等,将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地方债券发行乏力,存量债务到期也需要高度关注。

另外,鉴于明年经济增速放缓仍有一个触底过程,将对市场流动性带来一些冲击,有关部门需早预案。不过,目前股市已经很低迷,虽然不排除市场后续仍有波动,但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很小。

大力改善民企融资环境

中国证券报:民营企业的生产和融资环境牵动各方关注,应如何缓解企业融资难、提振企业家信心?

刘元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已达2726.3万家。民营企业数量占比和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但现实情况是,民营企业并没有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竞争环境。

因此,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帮扶。长期来看,解决的根本之道还是需要从制度改革上做大文章,要推动全社会良性的资金运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宏观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不能过度偏向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警惕政府信用和类政府信用的过度膨胀,进一步提振民营经济信心。

化解中小民营企业的短期风险,有关部门需着重几个方面:第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小企业融资应更多依存于内生性融资,而不能舍本求末。未来应该在产业链、销售链上做足文章。比如销售链金融疏通,关键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的营销模式。一些地方政府工程、大型国企的销售拖欠,是很多中小企业资金

周转不畅通的核心原因。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应针对民营企业的销售业绩来提供创新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第二,完善资本市场体系,给予民营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同等的市场地位、竞争环境。当前即便是大中型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都无法与国企同步竞争。

第三,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占比。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有关部门需早预案。不过,目前股市已经很低迷,虽然不排除市场后续仍有波动,但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很小。

中国证券报:近期各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了支持实体经济、民营企业的政策,接下来还有哪些改革和支持措施值得期待?

刘元春:金融支持政策、结构性的定向投放、重大项目的授信、民营经济的全方位支持等,起到了短期稳预期、稳信心的作用。而真正落实“六稳”还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将此前三年所实施的以“三去一补一降”为主体的改革,进行总结、梳理、反思,并以目前国内外大环境为契机,抓住市场主体和全体民众对于改革的共识,尽快推出第二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方案。

货币政策从目前M2数据来看,依然是偏紧的,应当在坚持信贷投放中性的原则下,适度提高M2增长速度,这对于应对经济增速趋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从短期货币投放角度看,降准应提上议事日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不高,而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依然过高,因此,通过下调准备金来释放货币供应,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降息方面,我认为在目前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我国汇率承压的局面下,降息的空间很小。

规划引领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2018天府金融指数发布会暨四川省科技金融发展规划(2018—2020年)发布会25日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了《四川省“十三五”科技金融发展规划(2018—2020年)》(下称《规划》)。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刘东表示,深化科技和金融结合是四川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探索四川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部署。

深化科技和金融结合

《规划》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科金融合,深度互联”、“创新驱动,监管并重”、“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为基本原则,强调做好科技金融顶层设计,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增加科技金融财政投入,优化财政资金运作方式;拓宽科技金融直接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规模比例;加强科技金融间接融资,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拓展军民融合特色领域等六大任务。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表示,《规划》在明确发展目标、强调



科技金融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资金支持、建设服务平台、构建保障体系方面亮点突出。

“《规划》突出了四川特色,结合四川省情,全面分析了四川省科技金融的基础条件,明确了四川省科技金融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四川省科技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刘东认为,《规划》的发布与实施,将对一千多支的发展战略,打通军民融合、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三个通道,充分释放科技金融创新引入的巨大潜力,激发市场的主体活力,引领经济转型发展,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东表示,下一步四川科技金融工作将牢牢把握时代的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紧紧围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理念,与改革创新合作为动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制度保证,用理念引领实践,用行动落实,抓好规划的全面实施。

明确三大资金支持方式

“《规划》强调了优化科技金融的三大资金支持方式。”王擎认为,三大资金支持方式三管齐下,既强调政府引导,又强调市场主导,将有效地满足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

王擎介绍,一是要加大财政投入,主要是消除科技领域的市场失灵,弥补科技领

域的市场短板,要用好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加大奖补范围和力度,壮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创新财政资金引导模式。二是大力发展创投、上市、债券等直接融资。三是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融资方式,增加对科技型企业的有效金融供给,争取投融资联动试点,扩大知识产权融资试点,优化科技金融中的风险分担机制。

此外,《规划》强调推动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拓展军民融合特色领域。王擎表示,一是深化成都高新区和绵阳国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二是探索省级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建设,推动成都高新区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创造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特色,在全省加速推广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此外,要推进科技金融的特色发展,推动绵阳市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科技金融结合新路径,积极构建军民融合、产业金融和人才体系。

在保障措施方面,《规划》提出,一是优化政策体系,强化政策保障。二是协同推进发展,加强组织保障。三是深化理论研究,集聚专业人才。四是细化责任目标,构建监督保障。五是加强监管协作,防范系统风险。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车亮摄